

張世祿先生學述

申小龍

復旦大學中文系



獻身語言學研究

張世祿先生 1902 年 11 月出生在浙江省浦江縣東鄉一個書香家庭。他的父親、叔父都是前清的秀才。張先生幼承庭訓，耳濡目染父輩教授的「四書」、「五經」一類的古書，從小就愛上了古文。在當時，「小學」是「通經」的基礎、入門的工具。從鄉辦小學到省立金華中學，他都以學習古文為主，這為他日後研究古代漢語打下了深厚的基礎。他所就讀的中學校長即是著名的語言學家金兆梓。金先生對古文的博識精斷給了張先生很大的影響。五四運動起，張先生首次接觸到白話文和英文。由於當時思想文化界正交織着中西古今的衝突，張先生對傳統小學的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嚴重局限感受尤深。他開始意識到，中國傳統語言研究必須採納西方語言科學的新知來加以革新、改造。1921 年，張先生考入南京國立東南大學中文系，承師於著名學者胡小石、陳中凡、顧實、柳詒徵、竺可楨、梅光迪、吳宓等。他開始對語言研究的功用和研究手段的科學化與精密化有了比較全面的認識。他通讀了清代語言文字學家的著作，如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朱駿聲的《說文通訓定聲》等。在傳統小學的文字、音韻、訓詁三個門類中，他感到音韻學最難弄通，因此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在胡小石先生指點下，看了高元的《國音學》及趙元任、林語堂、劉復、唐鉞等的著作。他參照比較中外語言學著作，逐漸把握了漢語傳統音韻學的各種概念範疇，從此選擇了用西方語音學

理論來研究中國傳統音韻學的科學研究道路。在學期間，張先生還聆聽了章太炎、梁啟超等先生的講學。1926年，張先生大學畢業獲文學士學位。次年他赴福建廈門集美學校任語文教師，開始了他漫長的語言研究與教學生涯。1928年至1932年，張先生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編譯員，兼任暨南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公學等校文字學、語言學、語音學講師。1932年到1939年，任暨南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及復旦大學、無錫國專、成明文學院、光華大學等校語言文字學教授。期間一度赴日本講學。1940年至1947年，張先生遠赴西南各省，先後擔任昆明雲南大學、坪石中山大學、桂林師範學院、貴陽大廈大學、重慶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四川教育學院等校語言文字學教授，並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在這些年間，張世祿先生出版了十多部語言學專著、譯著及五十多篇論文。他對國外漢學家馬伯樂、高本漢等人研究漢語的新穎的理論和方法感到濃厚的興趣，主張引進西方語言學的先進理論和科學方法。

1949年以後，張先生任南京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他到上海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在復旦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開設了語言學概論、現代漢語、古代漢語、漢語史、漢語詩律學等課程，研究重點從音韻學轉向詞匯學。他出版了一系列的詞匯學論著，其中上海本《現代漢語》的詞匯部分是他數十年研究的結晶。他還關心文字改革的工作，出版了《漢字改革的理論和實踐》一書及有關論文多篇。文革期間，張先生身心備受摧殘，晚年所做的一件極其重要的工作，是總結漢語語音的發展規律：起首輔音失落和複輔音單化，濁音聲母清化和鼻音聲母簡化，鼻音韻尾簡化和閉口韻消失，塞音韻尾失落和開音節字增多；韻母中元音混同化和等呼簡化，音節裏元音逐漸佔優勢和音節結構單純化；入聲消失和聲調種類減少，聲調上平仄長短關係消失和輕重音趨於重要地位。這幾條規律體現了整個漢語語音的發展由繁到簡的歷史。張先生晚年另一件重要工作是出版了系統的大學漢語教材《古代漢語》。這本著作對古代語法、詞匯等方面提出了富有創見的學說：漢語的語音、詞匯、語法三要素，基礎不同，學習和研究的方法也不同。語音在語言中物質性最強，與自然科學聯繫較緊密，各民族的語言規律往往有相同之處，所以學習漢語語音時宜多採用西方先進的技術和方法。與此相反，語法與思維形式有密切聯繫，民族性強，研究漢語語法不應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論和方法，而應從漢語實際出發尋找規律。詞匯的性質介於語音和語法之間，所以有一部分可以參考西方詞匯學，另一部分必須強調漢語的獨特性。

從1978年開始，他以耄耋之年帶了三屆碩士研究生和兩屆博士研究生，並繼續整理和發表專著及論文，還在語言學的一些新領域作新的探索。他的右眼動了白內障割除手術，依然終日伏案工作，手不釋卷。1985年，上海出版了四十多萬字的《張世祿語言學論文集》，集中了他畢生著述的精華。1991年11月16日，張世祿先生不幸

辭世。但他獻身中國語言學的熱忱、富於開拓性的成就和嚴謹優良的學風贏得了海內外語言學界的尊敬。

致力語文現代化

張世祿先生畢生致力於傳統語言文字研究的現代化。他傾注心血最多而成果最豐富的是漢語音韻學，1938年出版的《中國音韻學史》是第一部用現代語言學思想寫出的音韻學史專著。在這之前，張先生還出版了《中國聲韻學概要》(1929)、《中國古音學》(1930)、《廣韻研究》(1933)、《語音學綱要》(1935)等音韻學著作。這些著作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用西方語言學原理來研究整理傳統的音韻學。張先生認為，傳統音韻學上的種種紊亂現象，皆因使用方塊漢字標音，語音的變遷和紛歧無法在音讀上反映出來。今天，如果我們仍用漢字作標音工具而不運用現代科學的語音學方法來改進傳統研究，那麼，我們研究的結果最多也只能認識一些同音的雙聲、疊韻關係，而得不到具體的音素，得不到整個的音系。因此，中國音韻學必須採用一套適當的音標來作注音的工具，同時又根據現代語音學和語言學理論，輔以漢字以外的音韻材料，整理現代音，考證古代音。¹因此，從二十年代開始，張先生就引進了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學說。他先後翻譯了高本漢的《中國語與中國文》、《漢語詞類》、《詩經研究》、《老子韻考》等著作，直到去年11月逝世前還在主持翻譯高本漢的《漢文典》。有一次趙元任先生見到張先生時，把高本漢探討詞源的《漢語詞類》同章太炎的《文始》相提並論。張先生不以為然。他指出，《文始》和《漢語詞類》雖然都是由古音韻學研究的結果進而為漢語語源的研究，但兩書卻代表兩個不同的時代。舊式的音韻學，因為工具、材料和方法的缺陷，且無科學原理作基礎，其語源研究只能是古典式的、拘牽於漢字字形的，因此是主觀的、武斷的、不成系統的。而《漢語詞類》卻以現代科學為基礎條分縷析、層層推進，處處和中國舊時代的學術相對照。²正是這種科學理論使漢語音韻學有了新觀點、新材料、新方法，成為一門現代化的新學科。在張先生的音韻學著述中，我們處處可以看到這種現代科學的精神。張先生對高本漢學說的全面介紹，其深遠意義正在於他為實現中國語文現代化找到了一條必由之路。

張先生在積極引進西方語音學原理的同時，還十分注意用現代科學的方法來研究闡釋音韻學傳統。例如「清濁」概念在音韻學傳統上是個有歧義的概念。張先生指出，陸法言、孫愐等所說的清濁係指韻部的分析而言，不是近代用以辨別聲紐的清濁，也不是魏晉六朝用於刊明字調的清濁。雖然在音理上彼此有交互的影響，但在涵義上應

1 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上海書店1984年重印本，頁329。

2 《張世祿語言學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年，頁183。

當分別清楚。³張先生又進一步分析了清濁之所以意義多歧的根源，指出傳統音韻學以音感上的相對區分來歸納範疇。從前用五音的名稱來區別字調，雖然把音素的差異混在一起，但這種區分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所以字調的種類可以概括地用「清濁」、「輕重」一類的詞語來表示。後來受了佛經轉讀的影響，又為適應語音的實際，把字調區別為四聲，把音調的問題同聲韻的問題分開了。音素的差異雖然同樂音的高低沒有關係，但在實際聽感上，因聲紐或韻素的影響也可以使整個字音發生高低的區別，於是原來用以表示音讀上相對區別的清濁、輕重一類的詞語，也轉而表示音色方面絕對的差異。⁴在開始的時候，這種音色上的差異不區別元音和輔音的性質，把韻素差別和聲紐種類混在一起。因而「清濁」又兼表示聲和韻的相對區別，因為後來聲紐上的種類和配列、韻部上的開合等呼等細目，都是用體現聲學上相對差異的「清濁」、「輕重」來表示的，包含了各種標準。張先生就是這樣用現代語音學原理來闡釋傳統的漢語音韻學。張先生又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傳統古音學家的兩個通病：一是處置材料不精密。他們所把握的材料除了《詩經》、《離騷》及其他古書的韻語外，又取資於《說文》裏的形聲字系統，旁及假借、讀若、聲訓。這些材料並不屬於同一個系統，彼此間有時代和地域的分歧，從這種混雜性的材料所歸納得來的音韻系統，自然有許多字音出入相錯，而為了解釋這些矛盾變異的現象，就不得不由「合韻」說進而為「異平同入」之論，再進而為「陰陽對轉」及「正轉」、「旁轉」等曲為圓說。另一個通病是將韻部的區別絕對化，古音學家以為一個韻部僅包含一種韻值，於是對於許多穿錯易變的字音不得不立通轉的條例。條例繁衍仍不能統括字音的轉變，又不得不目之為雙聲相轉。⁵這兩點確實觸到了傳統音韻學的痛處。

張世祿先生另一個重要的領域是介紹和引進現代語言學的理論。從二十年代末開始，他先後出版了《語言學原理》(1930)、《語言學概論》(1934)、《語音學綱要》(1935)等理論著作，在我國建立普通語言學理論方面有重要的貢獻。張先生認為，中國的科學向來並不發達，過去語言學雖然有很多著述，但始終不能成爲一種科學。因此，我們要研究中國的語言，必須以西方語言學理論爲基礎；我們要考明漢語的性質和歷史，也必須先具有世界語言學的知識。⁶張先生在他二、三十年代的理論著作中，對語言的起源、語言的社會性、人類專有性及語言符號的任意性和語言同哲學、心理學、人類學的關係都有深入詳盡的論述。例如，對於語言的變化，張先生首先指出語言作爲一種社會的公器，它的變化是社會約定俗成而非個人的創造。然後指出考

3 同注1，頁144。

4 同注1，頁206。

5 同注1，頁288。

6 張世祿《語言學概論》自序，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

證語言的變遷須用歷史比較的方法，而不能用實驗的方法。張先生區別了語言變化的種種類型，然後指出，語言的變化大都由於自然的情勢而起；其中意義的變化是同社會事物的發展有關；形式的變化也是由於社會心理上對類別事物注意力不斷進步，要求以相同的形式來表示相同的意義；聲音的變化也是趨於便利。因此，語言的變化是一種進化。從本質上看，語言是一種社會習慣，如果不適用於現實生活，自然要起變化。語言的變化無時不在發生，而一種變化能夠在社會裏約定俗成，也必然是由於它符合當時社會的經驗。張先生關於語言發展是一種進化的觀點對於十九世紀西方某些學者的語言發展的進化論是一種否定。從語言發展進化的觀點出發，張先生又有力地駁斥了西方學者認為漢語是「太古語」、「初等語」的理論。他指出，語言發展的趨勢是單個的分析日益增多，句法的重要超過形態的變化。漢語的分析性強正是一種進化現象。漢語名為孤立語，實際上語詞在語句中是有機體的結合，決非各個孤立的語詞的意義在全句的總意義上自然顯現。沒有時態和性、數、格、人稱變化也決不引起含混。可見張先生在介紹西方語言學原理的同時，還注意用漢語的事實來檢驗這些原理，把漢語放在世界語言發展的大背景上來考察，努力建立能夠概括漢語事實的一般語言學理論。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張先生指出：漢語的科學研究，在語言科學的體系當中，是屬於一種特殊的語言學，與之相對的是關於一般語言的理論的研究。一般與特殊，在實際研究過程中有彼此不能分割的關係。一般語言的理論，必須到具體語言的現象中去獲得實在的根據；而特殊語言學上所研究的種種現象，也必定是服從於一般語言發展的規律的。所以要進行漢語的科學研究，必須將對漢語的精密考察與一般語言學上的精確理論結合起來。

(上接頁25)

這裏不妨再指出一點：這「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的句子，似乎也受了柳永詞的影響。柳的《望海潮》描寫杭州錢塘之繁華綺麗，曾哄傳一時，其中即有「怒濤卷霜雪」之句。(下略)

綜括上文所論，我以為如依《念奴嬌》正格，赤壁詞應如下讀；但古今語言，變動頗多，現代讀者自亦可另作選擇，故寫在括號內：

大江東去，浪聲沈(浪濤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處，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